

新诗评论

2015年第1辑(总第三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评论 第五年 第 5 辑(总第三辑) 洪子诚等主编 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五版
陈子冕 孙玉石 洪子诚

I 新... II 洪... III 新诗文学评论—中国 IV 文学评论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五)第 号

书 名:新诗评论 第五年 第 5 辑(总第三辑)
主 编: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
本 辑 编 辑:张桃洲
责 任 编 辑: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陈子冕 孙玉石 洪子诚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号 邮编
网 址: 电话: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电 话: 邮购部 发行部 编辑部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页 数: 页 开 本: 印 张: 千 字
年 月 第 版 年 月 第 次 印 刷
定 价: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观察与言论

是何种中华性 ,又发生在谁的边缘 ?

..... [荷兰]柯雷(西奔)著 曹菲译 (猿)

海甸来信 :谈杨键及新诗语言的本土化 田一坡 (猿)

四十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 周 瓚 (猿)

新诗史研究

“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 :该如何讲述自己的“身世”..... 姜 涛 (猿)

“现代文化的荒原” :魏疆艾略特、现代主义、中国新诗 ... 张松建 (猿)

“文革”后民刊与新时期诗歌运动 李润霞 (猿)

问题与事件

什么是世界诗歌 ? [美]宇文所安(宇文)著 轶

洪越 译、田晓菲 校 (猿)

进与退 :“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 [美]宇文所安(宇文)著 轶

洪越 译、田晓菲 校 (猿)

诗人研究

“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

——长诗《哈拉库图》与诗人昌耀的精神历程 易 彬 (猿)

梦想导游论夏宇 陈义芝 (猿)

穆旦专辑

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段从学(圆缘)

1957年在穆旦的短暂“重现”..... 胡续冬(圆缘)

重读、重述抑或“重估”

——关于穆旦和穆旦研究的札记..... 王 璞(圆缘)

访 谈

未曾停驻的人生追求

——绿原访谈录..... 姜 涛(圆缘)

诗与生命交相辉映

——蔡其矫访谈录..... 伍明春(圆缘)

翻译与接受

绿色的词语 约翰·克莱尔..... [美]海伦·文德勒著 钱 敖译(圆缘)

本辑著者、译者简介..... (圆元)

编后记..... (圆怨)

观察与言论

[荷兰]柯雷(~~西泽~~) : 是何种中华性 , 又发生在谁的边缘 ?

田一坡 : 海甸来信 : 谈杨键及新诗语言的本土化

周瓛 : ~~国殇~~ 中国大陆诗界回顾

圆

新诗评论

是何种中华性 ,又发生在谁的边缘 ?

[荷兰]柯雷(西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应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的要求 ,本文上半部分略说西方对中国新诗的了解 ,下半部分略说鄙人最近所做的研究 ,主要针对当代中国大陆先锋诗文、诗人的性质与其社会身份的互动。

有许多广义和狭义的“中国” ,比如文化中国(广)和当代中国大陆(狭)。“国内”同样有多种解释。用这两个概念时 ,本文主要依靠上下文 ,并未处处加以明确的解释。

是何种中华性 ?

有无数按照地理、语言、文化、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建设的团体在惯常话语中都属于“西方” ,但其间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区别。拿纽约与伦敦的英语诗坛相比 ,和拿纽约或伦敦与昆明或广州的中文诗坛相比 ,前一组之间可能更加接近 ,但纽约与伦敦的诗坛并非一回事 ,波兰、意大利、新西兰又并非一回事。而且 ,世界上的人、语言以及文本日益增多的易动性 ,也进一步加速了多元化的过程。既用日语又用德语写作的日籍德国移民的日本女诗人多和田叶子属于西方吗 ?中国土生土长的 ,既在北大又在加州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的 ,在北美一座高校讲课而又“回国”开会的学者黄亦兵呢 ?同时出版作者与译者几乎

* 本文是荷兰莱顿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柯雷教授(西泽译)于 2002 年 10 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

重叠的双语集子诗人麦芒呢？西方仍然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内学术界仍然看得到一种叫做西方的东西，仍然把它建构成中国与西方互相作为他者的二元对比的一面。此情况是有历史背景的，西方在翻译中失去其内在的差异性并非惊人之事。相反亦然：内在多元的中国（在此指文化中国）在西方眼光中，常常遭受过度的同质化，而这不仅仅是外行之罪。那么，西方在哪里？

至于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对在任何意义上所谓的代表性都要持怀疑态度。先不说西方，就我校以前写过或正在写关于中国新诗的博士论文的学者而言，连这种小小的本土或本校传统，我也不敢代表。此外，本文必然反映出本人是专门研究当代中国大陆先锋诗歌的，换言之，我对许多其他种“中国新诗”的了解较为浅薄。

同样重要的是，在文化中国的不同地区与不同学术传统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区别。再者，日本和韩国都有悠久强大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传统，这又是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外国”对中国新诗的研究的表现，好在本次大会会有好几位日本、韩国学者参加。

虽然以上描述带有保留之心，本文还是试图提供一些想法，即使只是为了促进大家重新考虑像“西方”和“中国”那种过于笼统的范畴。在洛杉矶与北京、在西方与中国，或在西欧与东亚研究中国新诗的方式之间，以前很明显的界限有不少已为近几十年学术界的全球化所擦掉了，或至少变得模糊到快失效的地步。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拒绝最近流行的，声称“一切都是全球，一切又是本土”那种说法，或许确实能找到一些有趣的西方与中国的新旧不同处。本次会议也许能够阐明的一个问题是中华性现象。像文科中的其他概念一样（比如诗，又比如美），中华性这个概念可以让人琢磨一辈子，因为琢磨者自己就是给予它意义和力量、使它形成的因素之一。在座的许多人或所有人都用各种方式谈到过中华性，但既是因为学术内在发展，又是因为大气候的全球化倾向，中华性有可能在今日具有前所未有的易变性。

资料的分类

在西方的高校课程、学术论文、文学出版物上能看到的中国新诗是

一套或几套经典化的资料。成功率或流行率的高低之分意义上的经典化,无所不在,从最“高雅”的到最“通俗”的各种文化生产一律如此。中国新诗经典在西方比在国内的“淘汰率”要高,换言之,能获得经典身份的作品要少。原因很简单,即经典的空间小。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或在汉学课程中还是在一般书店的书架上,中国新诗都只能占领较小的领域。一来,在重点学校,比较文学要容纳许多语言、文化、民族的传统,汉学又要容纳许多不同学科(文学、历史学、哲学、思想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史与物质文化研究、文学、戏剧学与电影学等)。二来,在西方的中文资料,即诗歌本身以及各种相关文本,从诗歌流派的宣言到学术论文,至今仍然很有限。而且,跟汉语为母语者比,外语为母语者阅读、消化中文资料的速度慢。新诗的西语译文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后面的问题,同时给学汉语的人加上更多的欣赏者。但显而易见,任何文学的学术研究,不管牵涉几种语言,从原文入手还是最理想的。

西方的中国新诗经典是如何形成的?既是在学院,又是通过针对广泛读众的翻译工作。首先,作为第一个阶段,国内的经典化起着关键的作用。有国内经典提供的原料,才可能有在国外的第二阶段。后者的结果不能超过上述的小小的空间。最后容纳哪些作者和作品,主要由专家的选择决定,即设计学院课程的学者和广义文坛上的文学代理人以及翻译家。专家并不是经常把未入国内经典的资料直接输入第二阶段。但这种事情也存在,并不像以前那么罕见,因为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国。所以,本文中的“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严格来讲,意味着“在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或“用西语发表关于中国新诗的学术论文”,翻译界也一模一样。而且跟过去比,外国人在近几十年更有机会长期住在中国国内,亲身体会广义的中国及其各种具体的表现。从国内到西方,或是说在经典化的两个阶段之间,上述高低之分还经常发生变化。系统地指出变化中的规律或典型有待进一步研究,得考虑国内和西方对于中华性的各种理解。无论如何,经典化的第二阶段并非简单接受国内经典最高的百分之几或十分之几。诗人和诗文在国内的成功率或流行率未必能预告其在西方的相对身份。拿当

之颖、李欧梵、米佳燕);中国香港(比如梁秉钧);中国台湾(比如叶维廉、黄丽明、奚密与后二位合编的《世纪源》);中国大陆(比如许芥昱、杨小滨)。当然,这些范畴内部又有不同种类,经常也还是地缘政治性的,或至少政治性的。比如民国时期的战争年代、中国台湾的乡土运动、中国大陆的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期(二者的对比和朦胧诗的崛起纷纷产生了许多论文,树森为较早的一例)、国民党源年代末迁到台湾对于散居或流亡诗歌的关键时刻等。如果给个人和多人 在刊物和书上发表诗歌作品的西语译文装上地缘政治性或纯政治性的框架,就可能产生过度政治化的效果,几乎把文学再现成政治的副产品或对于政治的反映而已(比如《源》和《源》在英语选本序中的语调)。对于大部分中国新诗来说,有文本上的证据可证明这种政治化是不准确的。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好是这些作者或编辑在自己的文章中最大声地指控国内政治在某些地点某些时间对于文学的压抑。

然而,仅几十年,在西方,不少研究者也开始把各种不同潮流或流派的划分法用做分类标准。就像上述的地缘政治性标准那样,在这一方面,国内国外的相同处十分清楚。这种或许更加是文学内在的标准包括文艺审美、历史背景、国内地理(比喻的和字面意义的)、作者的(社会)性别、文化生产与发表的媒体等。能举的例子极其多,本文只提现代主义的不同种类与时段(比如《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如《源》);女性诗歌、(社会)性别及相关问题(比如《源》);本土诗坛,像南京诗坛、“南方诗歌”、四川诗坛(比如《源》);网络诗歌(比如《源》)。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以及给一般读者的介绍还有极其重要的一个范畴,即对于个别的作者和作品的个案研究,包括几页的

- (甲)诗歌作品:作为自足性的、“纯”文学性的文本,无需依靠诗人传记或大气候的历史语境。
- (乙)诗歌作品:作为文学性文本,即本身能够引起考察(动机有多种,得看个别读者赞成的文学观,比如“诗言志”,或“文以载道”,或在讲“内容”之前先使读者注意“形式”或语言本身的某种用法),但同时(也是同样重要地)反映本土社会经济方面或文化方面的历史情况;诗歌作品甚至可以作为纯粹的历史纪录证据,已不仅作为文学性文本。
- (丙)诗坛各方面。
- (丁)诗话、诗学、诗观,既是明确的又是含蓄的;包括“诗人观”,即对诗人性质和身份的看法。

以上四种视角并非互相排斥的,反而经常在个别学者的著作中汇合,又能容纳许多(丙)不同的理论以及(丁)相关方法。举几个例子:(丙)版本学、语言分析、接受审美与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文学的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研究、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散居研究和流亡研究、翻译研究、朗诵研究等;(丁)各种各样的方法,从朗诵现场录音和建设在线的“网站馆”(即,下载和系统地保存关于中国新诗的国内外网站,比如海德堡大学与莱顿大学合办的“[中国新诗网](#)”和“[中国新诗网](#)”)又学在线档案,网上搜索“[中国新诗网](#)”,选“[中国新诗网](#)”)到分析诗歌作品的重音节奏和细读的其他种类。

本人近年采取的一种粗糙的分法是文本、上下文或语境、元文。文本(甲)指诗歌作品本身,上下文或语境(乙)指文本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元文(丙)指关于诗歌的话语。此分法能够说明,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新诗绝对是多方面的。但又不一定已达到平衡,或许需要特别鼓励和促进其组成部分中的一种或几种。希望本次会议在此方面能有帮助,不但是对国外学术界,而且也是对国内学术界。

近年倾向

西方对中国新诗研究的近年倾向这一话题令人想起两条词汇,即学科化(普适性理论框架)和理论化(地域型框架)。尤其是在二战后,对于所谓“非西方”的各个地方的文学、历史、政治、宗教等的研究已不限于韩文系、日文系、中文系之类的地域型机构(“非西方”一概念当然有巨大问题,但这在本文讨论范围以外)。像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历史、艺术史之类的学科型的院系其实仍然未能摆脱不同程度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此问题不但表现在能够进入其视野的资料中,在声称它具有“普遍”价值的各种理论框架中也含蓄地继续存在着。但不容置疑,“学科型”院系对于非西方世界各个地方的兴趣和了解有所提高。结果,既是非西方文学的西语译者,又是了解原文资料但属于学科型机构的“地域专家”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学科型机构在此可指比较文学系,也可指跨学科和地域之间界限的其他的机构化的合作形式。

因此,从20世纪传统上的考证(责任框架)与“翻译性学术”开始,对非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已彻底多元化(请见上述视角、理论、方法等问题)。对非西方文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把它通过(字面意义的)翻译提供给西方的读众。一个人未受过原文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高级教育,便不可能完成广义上可靠的译文。这种教育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又不能够同时也花在学科型理论的训练等问题上。地域型院系在理论方面的要求没有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之类的学科型机构高,但对中国新诗的研究要是没有最起码的明确理论框架,便不符合今日西方的学术标准。

问题关键

何谓“中国新诗”?

当时与会者请回忆一下,1982年在武夷山的“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和1984年在香山的“中国新诗理论国际研讨会”。二次大会均发生过关于以上问题的激烈讨论,比如“汉”指“汉族”,还是指“汉语”呢?后

怀疑态度(比如 蕴、曹、孟、轲、刘、禾、奈、奥、杜、李、典、月、里、斗、王、屏、勺、森、再、恩、操、特、马、志、伍、森、奥、等。反过来讲,把诗性与某个个别的语言连在一起当然也未必意味着,文本便不可译成任何其他语言。但无论如何,我们用各种渠道发表中国新诗的丹麦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挪威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译文,也在学术论文中引用这些译文,还希望读不到原文的比较文学家也引用。这一切都显示了一种广泛的,对于可译性的基本信仰。这使以上的假设不足以说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动机,也不足以说明我们的诗观以及相关的,对于自己的研究客体的学术合法性的看法。说我们研究中国新诗是因为它是中文的,简直是不够的,也不会使任何编辑自动接受我们的译文和论文。

这种情况在俄亥俄州大学的 配、紫、调、世、悦、子、泽、彩、蓝、明、胡、李、世、悦、志、蓝、轲《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为科罗拉多州大学的 配、紫、调、世、悦、子、泽、彩、蓝、明、胡、李、世、悦、志、蓝、轲《中国现代文学》续刊)、岭南大学的 分、悦、世、悦、志、蓝、配、紫、调、世、悦、子、泽、彩、蓝、明、胡、李、世、悦、志、蓝、轲《现代中文文学学报》之类的专业学术刊物,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 砾、世、蓝、译、轲《译丛》、荷兰比利时汉学家合作办的 勺、森、再、恩、操、特、马、志、伍、森、奥、等《文火》之类的专业中外文学翻译刊物所创造的空间里,也许能够称得上例外。但先不说我们学术和翻译本身的水平,虽然原文资料的语言认同是这些刊物创刊的一个基本考虑,但是编辑还会问的,我们的稿子为何值得发表呢?粗略地归纳,在这种始终集中于中文资料的语境当中,我们回答编辑的问题需要依靠两种东西。要么,有另外一种或几种非语言的中华性,能够用外语重新讲述,或许对于这些外语所属于的其他文化是新鲜的;要么,是学科性的,或“纯文学性的”价值。当然,“纯文学性”不存在,但不妨我们把它用做一条渐近线。

不限制于或不集中于一定地域或语言的刊物也有助于说明情况。在它们那里,任何中华性都未必算数。换言之,中华性并非其标准,尽管也许至今尚未有过其他学者研究过该论文或译文所阐明的中国文化特点。其实,在所谓纯学科性刊物常见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哪怕是下意识的)使编辑和评审员有时过多地要求用在汉学中常识的地域性“上下文”来补充主要论点。而这点,没准又会导致“例外

主义”的谴责。

国内学者呢?把“中国新诗”解释为“中文现代诗”,就能抓住他们工作的性质吗?作为他们出发点的诗观是不是把中国新诗的诗性与作为个别的语言的中文连在一起?拿当代中国大陆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涌现过一种对于进口的多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极度热情和兴趣,但是后来,特别是从90年代起,文化界和学术界开始重新考虑来源文化(比如“西方”)和接受文化(即“中国”)以及二者的复杂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也重新评价中华性和中华文化认同。国内关于诗歌的话语,比如有近年常提到“字思维”和更广泛的“汉语(天然)的诗性”之类的东西。然而,为了证明学术工作的合法性,国内学者未必一直在强调其研究客体的语言是作为个别的语言的中文。在此方面,国内与国外的情况相同。国内学术工作的动机,还有其对编辑的吸引力,也必然在于一种或几种非语言的中华性(比如,诗歌作品反映着社会变化)或在于其学科性的、“纯”文学性的价值。据我估计,下面一句中的“他国”能容纳许许多多国家,荷兰肯定是其中之一。“中国新诗”与“他国新诗”重要区别在于,在中国,诗歌与国粹、文化认同、政治事业被联想到一起,经常是当然之事。中国传统诗学、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产生的文艺政策,还有1958—1960年先锋诗界中的“民间”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均是如此。

那么,除“中文性”之外,如果我们研究的文本中有些东西是“中华”的,能体现中华性,这又与上述的视角、理论、方法问题发生何种关系?在(乙)视角中,诗歌作品是文学性文本,但同时也是本土历史发展的反映或纪录,能够容纳大量的非语言的中华性(比如,1958—1960年毛泽东时代朗诵现象)。针对诗坛各方面或更广泛的文学社会学问题的(丙)视角一样,同样重视本土特色(比如,1958—1960年毛泽东时代朗诵现象),特别是可称之为“政治坐标轴”概念)。焦点在诗观和诗人观的(丁)视角与(丙)较为相似,也能够容纳许多非语言的中华性,既是因为上述现当代本土特色,又是中国传统诗学至今对现当代诗学所发生的影响(比如,1958—1960年毛泽东时代朗诵现象,以及杨炼与中国传统)。只有针对作为自足性的、“纯”文学性的文本的(甲)视角才是例外,因为它主要关心的不